

长江经济带发展潜力与两岸合作机会^{*}

魏后凯

内容提要 长江经济带的地位在经历了 1979~2008 年的急剧下降后,近年来呈现出稳步提升的态势,目前已进入持续快速增长的“大发展”时期。长江经济带的空间分异自 2003 年以来逐渐趋于缓和,且中上游地区的发展水平日益接近,过去典型的“三级阶梯”结构正日益被“两级阶梯”的二元结构所取代。从发展趋势看,长江经济带有条件建设成为继沿海经济带之后主导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核心支撑带,其发展空间和巨大潜力主要在中上游地区。加快长江经济带建设,既给海峡两岸带来了诸多合作机会,也将为中国经济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长江经济带 发展潜力 空间分异 两岸合作

长江经济带以长江“黄金水道”为骨架和纽带,从东到西横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11 个省市,土地面积约 205 万平方公里,2014 年地区生产总值 (GRP) 占全国 (未包括港澳台,下同) 的 41.6%^①,出口总额占 45.8%,承载人口 5.84 亿,占全国的 42.7%。建设长江经济带是当前中国正在实施的“三大战略”之一。很明显,在当前中国经济进入以“增速减缓、结构优化、动力多元、质量提升”为基本特征的新常态发展阶段的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将成为继沿海经济带之后主导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核心支撑带,其在未来中国“协调东中西、统筹南北方”大战略中处于枢纽地位。长江经济带的崛起将为中国经济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长江经济带战略提出的背景和过程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陆大道就提出把

沿海地区和沿江地区作为全国国土开发和生产力布局主轴线的“T”字型战略构想。^②1985~1987 年国家计委组织编制的《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草案)吸纳了这一思想,明确提出“在生产力总体布局方面,以东部沿海地带和横贯东西的长江沿岸相结合的‘T’型结构为主轴线”^③。虽然该规划由于多方面原因未上报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但它对后来中国国土开发和生产力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 世纪 90 年代,长江经济带被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框架。1992 年 6 月,国务院召开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江地区经济规划座谈会,提出了加快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江地区开发和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1992 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提出了“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城市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的长江流域开发思路。1995 年 9

^{*} 本文系作者于 2015 年 9 月 19 日在台北中华经济研究院参加“中国大陆‘十三五’期间开展两岸经贸合作策略研讨会”提交的学术论文。韩镇宇参与了本文部分数据的计算整理,在此表示感谢。

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推动形成“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经济带”。1996年3月,国家“九五”计划又提出,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要“以浦东开放开发、三峡建设为契机,依托沿江大中城市,逐步形成一条横贯东西、连接南北的综合型经济带”。

自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连续3年GDP增速在8%以下,2012~2014年平均为7.6%,已经结束了高速和超高速增长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要寻求持续快速增长,必须培育新的增长极和增长带。长江经济带就是这种能够支撑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新增长带。2012年12月,李克强在江西九江主持召开长江沿线部分省份及城市负责人参加的区域发展与改革座谈会上指出,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西部回旋余地和空间更大,沿江地带是重要的战略支点”。2013年9月,李克强又做出批示,提出“依托长江这条横贯东西的黄金水道,带动中上游腹地发展,促进中西部地区有序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打造中国经济新的支撑带”。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这意味着长江经济带被再次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框架,并正式提升为国家战略。2014年6月,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打造长江经济带。

经过大量的前期研究和多次讨论修改,2014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定位和总体发展思路,提出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同时以附件的形式公布了《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2014~2020年)》。此后,四川、重庆、安徽、江苏、江西、湖南、湖北、上海等省市纷纷响应,先后出台了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实施意见。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明确提出重点实施“一带一

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2015年初国务院成立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由张高丽任组长。

作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继先期批复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2010年)和《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2011年)之后,2015年3月国务院又批复了国家发展改革委报送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把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成为长江经济带重要支撑、全国经济新增长极和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城市群。2015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工作方案》,明确从中央预算内投资中设立专项,在2015~2020年间对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相关项目建设给予补助。2015年的补助标准以总投资扣除征地拆迁费用为计算基数,东部地区项目按15%、中部地区项目按20%、西部地区项目按25%的标准予以补助。2015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又发布了《关于建设长江经济带国家级转型升级示范开发区的实施意见》,提出以长江经济带国家级、省级开发区为载体开展国家级转型升级示范开发区建设工作。目前,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编制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已上报国务院,即将批复实施。

长江经济带发展变迁及空间分异

长江经济带被称为“龙的脊梁”,在中国经济中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改革开放之前,尽管长江经济带GRP占全国的比重出现了较大波动,但均在41%以上,1952~1978年平均为43.1%(见图1)。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长江沿线地区被作为全国国土开发和生产力布局的主轴线,但整个长江经济带GRP占全国的比重却在小幅波动中不断下降,由1979年的44.6%下降到2008年的39.9%,减少了4.7个百分点。这说明,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全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宏观背景中,长江经济带处于相对衰退之中,其在全国的地位明显下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在国家战略布局中,国家开发开放的重心主要集中在沿海经济带,而对长江经

济带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T”型主轴线布局构想,虽然被吸纳进《全国国

土总体规划纲要》(草案),但由于该规划未正式批准实施,因而更多停留在学术探讨和规划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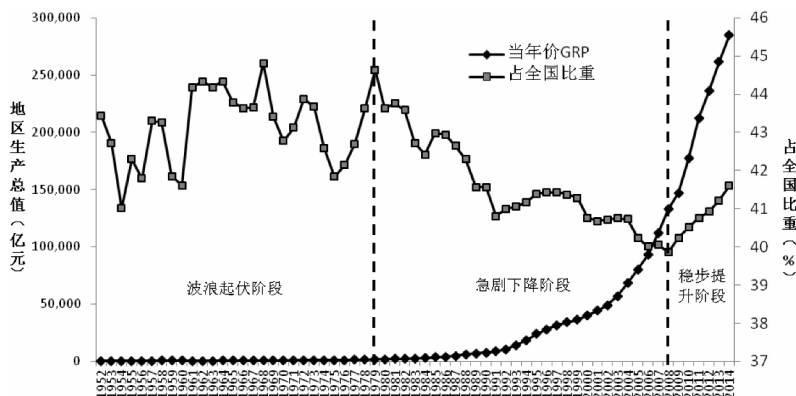


图1 长江经济带 GRP 及其占全国的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各地区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摘要》(2015) 计算。

2008 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促进中部崛起战略的深入实施,长江中上游地区经济增速明显加快,开始进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在这一背景下,长江经济带 GRP 占全国的比重开始趋于上升,到 2014 年已提升到 41.6%,比 2008 年增加了 1.7 个百分点。当然,这一时期长江经济带在全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也与国家对于长江经济带的高度重视密切相关。这期间国家先后批复了《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并批准设立了重庆两江新区、贵州贵安新区、湖南湘江新区等。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江经济带经济地位的变化,大体可以分为波浪起伏(1952~1978 年)、急剧下降(1979~2008 年)和稳步提升(2008 年之后)三个阶段。目前,长江经济带已经进入了持续快速增长的“大发展”时期。

为了反映长江经济带的内部空间分异,我们计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江经济带省际和上中下

游之间人均 GRP 的泰尔系数。泰尔系数最早由泰尔提出^④,是衡量地区差异和空间不平等的重要指标。从省际差异看,改革开放之前,尽管泰尔系数出现较大波动,但总的趋势是不断增加的(见图 2)。这说明,改革开放之前长江经济带的省际差异在不断扩大。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人均 GRP 省际差异在 1978 年至 1990 年曾出现大幅缩小,泰尔系数从 0.2322 下降到 0.1023,但 1990 年至 2003 年又开始趋于扩大,此后开始出现逐步缩小的趋势。从 2003 年到 2013 年,长江经济带省际人均 GRP 泰尔系数从 0.182 下降到 0.0876,下降了 51.9%。很明显,近年来长江经济带省际差异的缩小主要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增速放缓,而其他省份经济增速加快的结果。在 2005~2014 年间,上海 GRP 年均增长 9.8%,浙江为 10.5%,江苏为 12.1%,而除云南外,其他省份均高于 12.1%,重庆则高达 14.0%(见表 1)。尤其是在 2012~2014 年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上海、浙江的增速已经下降到 8% 以下,江苏也只有 9.5%,而其他省份仍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态势,平均增速均在 10% 以上,重庆和贵州则高达 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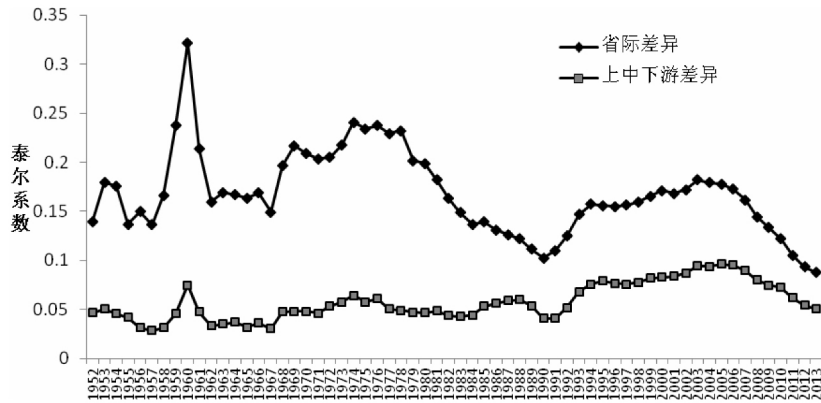


图2 长江经济带人均 GRP 泰尔系数的变化

注:2000 年以前人均 GRP 按户籍人口计算 2000 年及之后按常住人口计算。

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各地区统计年鉴计算。

表 1 近年来长江经济带主要经济指标变化

	GRP 年均增速(%)		2014 年人均 GRP(美元)	工业增加值比重(%)			城镇化率(%)			
	2005~2014 年	2012~2014 年		2010 年	2014 年	年均变化	2010 年	2014 年	年均变化	
长江经济带	11.9	9.7	7931	43.2	40.1	-3.1	48.71	54.24	1.38	
省份	上海	9.8	7.4	15847	38.1	31.3	-6.8	89.30	89.60	0.07
	江苏	12.1	9.5	13328	46.5	41.7	-4.8	60.58	65.21	1.16
	浙江	10.5	7.9	11878	45.7	41.7	-4.0	61.62	64.87	0.81
	安徽	12.3	10.6	5604	43.8	46.0	2.2	43.01	49.15	1.54
	江西	12.2	10.3	5643	45.4	44.5	-0.9	44.06	50.22	1.54
	湖北	12.6	10.4	7671	42.1	40.2	-1.9	49.70	55.67	1.49
	湖南	12.6	10.3	6558	39.3	39.7	0.4	43.30	49.28	1.50
	重庆	14.0	12.3	7791	46.7	36.3	-10.4	53.02	59.60	1.65
	四川	12.7	10.4	5719	43.2	43.5	0.3	40.18	46.30	1.53
	贵州	12.8	12.3	4297	33.0	34.0	1.0	33.81	40.01	1.55
云南	11.4	11.0	4438	36.0	30.4	-5.6	34.70	41.73	1.76	
按上中下游划分	下游	11.3	8.9	11085	44.5	40.7	-3.8	59.06	63.37	1.08
	中游	12.5	10.3	6678	41.8	41.0	-0.8	45.69	51.70	1.50
	上游	12.7	11.2	5456	41.3	38.0	-3.3	39.64	46.10	1.62
按三大地带划分	东部	11.1	8.6	13192	44.6	39.8	-4.8	65.18	68.81	0.91
	中部	12.5	10.4	6390	42.2	42.1	-0.1	44.99	51.03	1.51
	西部	12.7	11.2	5456	41.3	38.0	-3.3	39.64	46.10	1.62

注:东部包括上海、江苏、浙江,中部包括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西部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和《中国统计摘要》(2015)计算。

长江经济带横贯东西,是连接东中西三大地带和沟通南北方的重要纽带。为了反映长江经济带的东西空间分异,我们采用地理学方法,将经济带划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区。其中,下游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中游地区包括江西、湖北、湖南,上游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和云南。总体上看,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间人均 GRP 差异要小于省际差异,变动幅度也相对小些。从变动趋势看,新中国成立一直到 1991 年,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间人均 GRP 泰尔系数在波动中大体趋于稳定,之后上中下游地区间差

异开始出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这种状况直到 2005 年才得到根本扭转。自 2005 年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促进中部崛起战略取得实效,长江中上游地区经济增速不断加快,上中下游地区间人均 GRP 差异开始逐步缩小。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安徽在地理上被划入下游地区,但其发展水平和经济特点与中上游地区十分相似。因此,从地理学角度的上中下游划分方法,实际上低估了长江经济带发展水平的东西差异。如果按照东中西三大地带进行划分,长江经济带发展的东西差异要大得多。2014 年,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人均 GRP

是上游地区的 2.03 倍,而东部地区则是西部地区的 2.42 倍(见表 1)。而且,随着长江经济带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加快,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日益接近,过去典型的“三级阶梯”结构正日益被“两级阶梯”的二元结构所取代。在这种二元结构中,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水平较高,处于支配和控制的中心地位,而其他地区发展水平较低,属于被支配和被控制的外围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 1992 年,国家设立了浦东新区,并希望通过浦东的开发开放来带动上海、长江三角洲继而整个长江经济带尤其是中上游地区的发展。然而实际上,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和“十五”时期,浦东的开发开放虽然带动了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但它对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带动作用非常有限。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这期间国家把开发开放的重点仍然放在长江下游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另一方面,上海离中上游地区的空间距离较远,在距离衰减效应作用下,浦东的开发开放很难辐射带动整个中上游地区的发展。其结果,在改革开放以来较长一段时间内,长江中上游地区出现了被“边缘化”的趋势,其与下游地区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⑤显然,要缩小这种差异,关键在于加快中上游地区发展的步伐。

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潜力与空间战略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沿海地区的高速增长来拉动的。按照 1978 年不变价格计算,在 1979~2013 年间,沿海经济带对各地区 GRP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0.4%。从图 3 中可以看出,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以来,沿海经济带 GRP 占全国的比重一直在不断提升,从 1967 年的 48.4% 提高到 2003 年的 61.4%,增加了 13.0 个百分点。经过改革开放以后三十多年的大规模开发建设,目前沿海经济带已经成为主导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撑带。然而,随着发展基数的提高和转型升级压力的加大,近年来沿海地区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其 GRP 占全国的比重逐步下降。2012~2014 年,沿海经济带 GRP 年均增速已下降到 8.8%,比长江经济带低 0.9 个百分点,更远低于长江中上游地区(见表 1)。沿海经济带 GRP 占全国的比重也由 2006 年的 61.4% 下降到 2014 年的 57.6%。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后,要保持有质量的中高速增长,单纯依靠沿海地区已经远远不够,急需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培育新的国家级增长极和经济支撑带,推动形成多中心网络开发的新格局。^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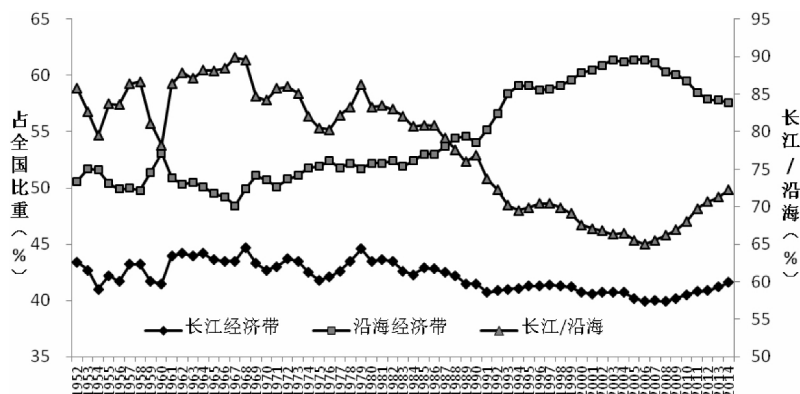


图3 长江经济带和沿海经济带 GRP 占全国比重的变化

注:沿海经济带指沿海 12 个省市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

资料来源:同图 1。

长江经济带交通区位优势,基础条件较好,发展潜力巨大,有条件建设成为继沿海经济带之后,又一条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新增长带。

首先,长江经济带依托长江“黄金水道”,交通便利,人口、产业和城镇密集,要素组合较好,具备大规模开发建设的基础条件。目前,中国大多数城

市均面临缺水问题,而长江流域水资源丰富,长江航运能力相当于40条铁路,这就为临江现代化大工业发展和城镇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其次,作为长江经济带的主体部分,安徽及中上游地区现有发展水平较低,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有条件建设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2014年,长江经济带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均GRP分别只有东部地区的48%和41%,城镇化率也分别低17.8和22.7个百分点。较低的发展水平也预示着其发展潜力所在。第三,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后,尽管全国经济增速已逐步放缓,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但长江经济带中西部省份因发展水平低,目前大多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双加速”阶段,预计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将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在“十二五”时期,长江中上游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和城镇化速度均远高于下游地区(见表1)。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云南等地工业增加值比重的下降,是在缺乏制造业强力支撑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的结果。这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增加值比重的下降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工业化滞后的表现,而后者则是逆工业化的结果。第四,近年来长江经济带经济快速增长,2012~2014年GRP增速达到9.7%,尤其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均呈现出两位数的高速增长,长江三角洲地区近年来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也在逐步加快。这表明,长江经济带已经呈现出良好的快速增长势头。

由此可见,长江经济带的发展空间和巨大潜力主要在中上游地区。加快长江经济带建设,必须在继续抓好下游转型升级的基础上,把着重点放在中上游地区,促进上中下游地区协调发展、共同繁荣。首先,实行上中下游联动。上中下游联动是促进流域经济带协同发展和一体化的关键。要打破地区分割,强化分工合作,通过上中下游联动,推动下游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向中上游流动,推动下游产业向中上游有序转移,由此形成上中下游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局面。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中上游地区被“边缘化”,推动长江经济带形成全面发展、共同繁荣的新格局。当然,对中上游地区而言,要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还必须加快

转型升级的步伐,而不能单纯依靠承接下游的产业转移。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下,单纯的梯度推进思路将不利于中上游地区的发展。

其次,建设三大国家中心城市。从功能定位和综合实力看,上海理所当然是长江经济带的“龙头”。但是,长江经济带东西绵延数千公里,即便是“龙抬头”,也未必能够摆动整个“龙身”和“龙尾”。上海作为“龙头”的作用,更多是发挥引领、示范和标杆作用。这样就需要在中游的“龙身”和上游的“龙尾”,分别将武汉和重庆培育发展成为国家中心城市,使之成为辐射带动中上游地区发展的极核。其中,上海既是整个长江经济带的“龙头”,也是长江下游地区的极核,而武汉是长江中游地区的极核,重庆是长江上游地区的极核。这三大极核均应培育建设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目前上海和重庆已经明确为国家中心城市,而武汉还没有得到国家认可。现有5个国家中心城市主要集中在沿海和西南,从促进中部崛起和辐射带动长江中游地区的角度看,当前应把武汉明确为国家中心城市,以便加快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这样通过三个极核的互促互补和辐射带动,推动长江上中下游三大“板块”协同发展。

第三,积极培育三级城市群。长江经济带是由众多城市群串联而成的城镇密集带。目前国家已经确定了“三大两小”的城市群配置格局。“三大”是指长江三角洲、长江中游和成渝三个跨区域城市群,“两小”是指滇中、黔中两个区域性城市群。从长远发展看,长江经济带要重点培育三级城市群体系:一是世界级城市群,包括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其中,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在2020年前,长江中游城市群在2030年前,均有条件培育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城市群。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除了发挥好上海的“龙头”作用外,还要强化南京和杭州的副中心作用,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轴,构建多中心、网络化的协同发展格局。二是国家级城市群,包括成渝城市群和江淮城市群。过去有人主张将江淮城市群纳入长江中游城市群^⑦,也有人主张将安徽纳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事实上,从空间范围和经济联系看,目前江淮城市群是相对独立的,有条件建设成为

国家级城市群, 尽管某些城市有可能纳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范围。三是区域级城市群, 包括滇中城市群、黔中城市群和三峡城市群, 其核心城市分别是昆明、贵阳和宜昌。过去, 不少学者均把宜荆荆(宜昌、荆州、荆门)纳入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范围^⑧, 国务院颁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也将宜荆荆包括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之中。但是, 从长远发展看, 为了推动三峡经济区的建设, 将以宜昌为中心的三峡城市群建设成为相对独立的区域性城市群, 是很有必要的, 也是具备条件的。

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两岸合作机会

长江经济带作为引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带, 其开发建设将给海峡两岸带来诸多合作机会。这种合作机会将是全方位的, 不仅体现在投资和经贸方面, 也体现在科技教育、文化旅游、人员交流等诸多领域。依托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实施, 加强海峡两岸全方位合作, 携手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 将有利于在海峡两岸形成一种利益共同体, 从而开创互利共赢的新局面。

台湾地区与长江经济带在要素组合和优劣势方面具有互补性。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资本和技术力量雄厚, 管理经验丰富, 拥有一批著名品牌, 但岛内资源匮乏, 要素成本高, 发展空间受限; 而长江经济带尤其是中上游地区地域辽阔, 劳动力充足, 水资源、清洁能源、矿产、生物资源丰富, 要素成本较低, 但发展基础薄弱, 资金、技术和

人才的制约未得到根本解决。因此, 加强双方的投资和经贸合作, 将是海峡两岸合作的主体, 其发展潜力巨大。

台商对大陆的投资早期高度集中在粤闽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台商在大陆的投资出现了明显的“北上”趋势。^⑨这里所指的“北上”, 主要是从粤闽地区向长江三角洲地区转移, 江苏、上海和浙江相继成为台商在大陆的重要投资区位。根据台湾地区“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公布的数据, 台商在粤闽地区的投资, 1991年曾占台商在大陆投资总额的74.2%, 之后该比重不断下降, 2012年已降到19.7%。相反, 台商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投资所占比重, 则由1991年的14.1%迅速提高到2005年的64.1%。近年来, 台商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投资的比重已出现下降趋势, 而在粤闽地区投资的比重出现了一定回升(见图4)。与外商在华投资区位变迁不同的是, 台商投资在由粤闽地区向长江三角洲地区大规模转移后, 并没有继续“北上”, 至今为止台商在京津冀地区投资所占比重仍然很低, 其他沿海地区也没有得到台商的青睐。倒是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 台商在中西部地区投资的比重明显增加, 由2000年的1.8%迅速提高到2014年的21.5%。这说明, 随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促进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 近年来台商在大陆投资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西进”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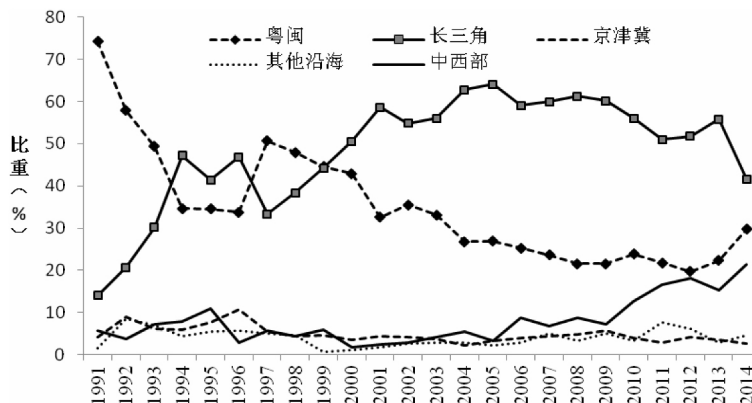


图4 1991~2014年台商核准对大陆投资地区分布

资料来源: 台湾地区“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

由于长江经济带的诸多优势和巨大潜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商在长江经济带的投资规模迅速扩大,所占比重急剧增加,由1991年的15.2%提高到2004年的66.8%(见表2)。之后,长江经济带台商投资占台商在大陆投资的比重均维持在60%以上,2014年略微下降到57.6%。然而,从上中下游的分布看,台商在长江经济带的投资高度集中在下游地区,这种情况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一定改变。自2009年以来,台商在长江经

济带的投资总额中,中游地区所占比重已由2.7%增加到2014年的7.0%,上游地区则由2.7%增加到18.6%。从投资领域看,目前台商在长江经济带的投资高度集中在制造业、金融及保险业、批发及零售业、不动产业。2014年,这四大行业合计占93.7%,其中制造业占64.7%,金融及保险业占13.8%,批发及零售业占11.0%,不动产业占4.3%。

表2 1991~2014年台商核准对中国大陆投资情况

年度	总计 (万美元)	沿海经济带		长江经济带		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分布					
		金额 (万美元)	所占比重 (%)	金额 (万美元)	所占比重 (%)	金额(万美元)			分布(%)		
						下游	中游	上游	下游	中游	上游
1991	17415.8	16413.1	94.2	2651.8	15.2	2459.1	175.7	17.0	92.7	6.6	0.6
1992	24699.2	23759.7	96.2	5966.9	24.2	5119.5	804.8	42.6	85.8	13.5	0.7
1993	316841.1	293785.8	92.7	113041.2	35.7	97943.6	7717.4	7380.2	86.6	6.8	6.5
1994	96220.9	88583.6	92.1	50563.4	52.5	45636.4	1469.3	3457.7	90.3	2.9	6.8
1995	109271.3	97313.4	89.1	53477.4	48.9	45288.8	6154.6	2034.0	84.7	11.5	3.8
1996	122924.1	119335.3	97.1	60961.3	49.6	57693.5	1913.3	1354.5	94.6	3.1	2.2
1997	433431.3	408836.4	94.3	165863.6	38.3	144883.4	13653.1	7327.1	87.4	8.2	4.4
1998	203462.1	194353.5	95.5	85668.2	42.1	79061.9	4025.2	2581.1	92.3	4.7	3.0
1999	125278.0	117910.8	94.1	61271.8	48.9	55399.2	2012.2	3860.4	90.4	3.3	6.3
2000	260714.2	256079.5	98.2	136210.9	52.2	133234.7	279.4	2696.8	97.8	0.2	2.0
2001	278414.7	271324.7	97.5	169714.7	61.0	163206.8	4240.2	2267.7	96.2	2.5	1.3
2002	672305.8	652728.8	97.1	385473.4	57.3	372746.4	6098.3	6628.7	96.7	1.6	1.7
2003	769878.4	737083.7	95.7	457571.5	59.4	432510.6	18150.4	6910.5	94.5	4.0	1.5
2004	694066.3	656121.6	94.5	463778.6	66.8	437927.7	15813.3	10037.6	94.4	3.4	2.2
2005	600695.3	580086.6	96.6	400818.9	66.7	386413.1	9662.5	4743.3	96.4	2.4	1.2
2006	764233.5	697020.7	91.2	510670.9	66.8	454068.8	7255.3	49346.7	88.9	1.4	9.7
2007	997054.5	928132.3	93.1	638990.3	64.1	601492.9	26011.3	11486.0	94.1	4.1	1.8
2008	1069139.0	974713.1	91.2	721150.9	67.5	661119.3	38504.8	21526.8	91.7	5.3	3.0
2009	714259.3	662015.0	92.7	460960.4	64.5	436152.8	12361.7	12446.0	94.6	2.7	2.7
2010	1461787.2	1277136.2	87.4	965612.9	66.1	833094.4	38595.2	93923.4	86.3	4.0	9.7
2011	1437662.4	1197411.5	83.3	941838.6	65.5	751563.0	41683.6	148591.9	79.8	4.4	15.8
2012	1279207.7	1045987.8	81.8	823202.6	64.4	690057.5	35562.1	97583.1	83.8	4.3	11.9
2013	919009.0	778278.0	84.7	598274.0	65.1	520903.8	30917.0	46453.2	87.1	5.2	7.8
2014	1027657.0	807106.6	78.5	591856.0	57.6	439907.7	41652.0	110296.3	74.3	7.0	18.6
1991~2014	14395628.3	12881517.7	89.5	8865590.3	61.6	7847884.9	364712.8	652992.6	88.5	4.1	7.4

资料来源:台湾地区“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

从长远发展看,加强海峡两岸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合作,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台商在投资区位选择上,不能只局限于长江三角洲地区,而应把投资重点逐步向安徽及中上游地区转移。皖江城市带、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黔中城市群、滇中城市群等作为国家重点开发区域,均具有良好的投资机会。其次,在投资领域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对台商的开放力度,不断扩大开放领域。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除了制造业、金融及保险

业、批发及零售业、不动产业外,基础设施、运输物流、文化旅游、现代农业、医疗养老、科技和信息服务等产业均具有较好的赢利空间。第三,要依托长江经济带主要中心城市和节点城市,发挥两岸各自优势,合作共建台商产业园区,尤其是科技产业园区。在有条件的地方,要加快建设一批国家级台资企业产业转移集聚服务示范区。第四,充分利用长江经济带科教力量雄厚的优势,加强海峡两岸科技教育合作,创建不同形式的教育和研

究联盟。2013年,长江经济带有普通高等学校1065所,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达1048万人,分别占全国的42.8%和42.5%;R&D人员全时当量占全国的44.1%,国内三种专利申请授权数则占56.9%。尤其是上海、武汉、重庆、南京、合肥、成都、长沙等城市,均为全国重要的科教中心。因此,加强海峡两岸的科技和教育合作潜力巨大。此外,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人文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加强长江经济带与台湾地区的文化交流和合作,不仅意义深远,而且潜力巨大。

- ①由于多方面原因,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GRP加总数远高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GDP总数。这里按长江经济带GRP占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加总数的比重计算。下同。
- ②陆大道《2000年我国工业生产布局总图的科学基础》,《地理科学》1986年第2期。
- ③陆大道《建设经济带是经济发展布局的最佳选择——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地理科学》2014年第7期。
- ④Theil, H., *Economics and Information Theory*,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67.

- ⑤魏后凯、蒋媛媛《长江流域地区开发规划:现状与展望》,《学习与实践》2009年第11期。
- ⑥魏后凯《新时期我国国土开发的新方略》,《绿叶》2009年第9期;魏后凯《建设长江经济带及重庆应对策略》,《改革》2014年第6期。
- ⑦张雅杰等《基于ESDA-GWR多变量影响的经济空间格局演化——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经济地理》2015年第3期。
- ⑧秦尊文《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构建》,《江汉论坛》2010年第10期;魏后凯、成艾华《携手共同打造中国经济发展第四极——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战略研究》,《江汉论坛》2012年第4期。
- ⑨晁罡、熊吟竹《台商在大陆投资的区域和产业分布特征分析》,《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作者简介:魏后凯,1963年生,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李芸)

《新定三礼图》点校商榷(一)

乔辉

丁鼎先生点校的《新定三礼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是目前《新定三礼图》较好的校注本。但《新定三礼图》卷帙浩繁,多有奥义,点校不易,故此本亦或有可议之处。笔者不揣鄙陋,选取其中一则,略加考辨于此。

“案郑《志》,大裘之上,又有玄衣,与裘同色,但无文彩耳。裘下有裳,纁色,朱袪素带,朱里,朱绿,终辟,佩白玉而玄组纆,赤舄黑絢纆。纯絢者谓拘舄之头以为行戒。纆,缝中絢也。纯,缘也。三者皆黑色。”(卷一《冕服图》“大裘冕”,第1页)

按“郑《志》”,当作“《郑志》”。《后汉书·郑玄传》:“门人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第1212页)《隋书·经籍志》记“《郑志》十一卷”,原注“魏侍中郑小同撰。”又“《郑记》六卷”,原注“郑玄弟子撰。”(第991页)《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并有《郑志》九卷、《郑记》六卷。《郑志》为书名,谓郑氏学志,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三。又,清王复、袁钧、钱东垣等并有《郑志》辑本。皮锡瑞有《郑志疏证》八卷,见《师伏堂丛书》。

“朱袪素带”,当读为“朱袪,素带”。朱袪,朱色之袪。袪是蔽膝,《诗·曹风·候人》《诗·小雅·采芣》等称芣,《仪礼·士冠礼》等称鞞、称鞞鞞,详《小雅·采芣》孔疏、《士冠礼》贾疏。据钱玄《三礼名物通释·衣服篇》(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31页),朱袪乃红色蔽膝;素带为白绢缝制的大带,则“朱袪素带”作“朱袪,素带”。

“赤舄黑絢纆。纯絢者谓拘舄之头以为行戒。”当读作“赤舄,黑絢、纆、纯。絢者,谓拘舄之头,以为行戒。”《周礼·天官·屨人》:“掌王及后至服屨,为赤舄、黑舄,赤纆、黄纆,青句,素屨,葛屨。”郑玄注“复下曰舄,单下曰屨。舄屨有絢、有纆、有纯者,饰也。”(第693页)《仪礼·士冠礼》:“爵弁,纁屨,黑絢、纆、纯,纯博寸。”(第958页)钱玄《三礼辞典》言“王与后之赤舄皆饰以黑絢、纆、纯”(江苏古籍1998年版,第1115页)。点校本所示读法,与文意不合,颇为不顺。

(作者单位:西安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ABSTRACTS

(1) Is Scientific Research Free of Value: In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Practice*Cai Zhong* • 37 •

The 20th century saw the problems in risk society bring forth some doubt towards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make scientists and policy – makers in confusion. The deep epistemological root lies in the idea of “free value objectivity”. In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practice, this idea not only is an epistemological illusion, but also results in a series of social problems. In practice of science, truth is “the significant truth”, which is combined with the fact and value. Value is the component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s well as the basic premise of normal produc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he benefit of science to the society. The introduction of value means that the task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is to change, namely, its normal thoughts are justification for rationality of science as well as a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 of governing science.

(2) “Practice Turn”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Xing Dongmei Chen Xiaogang* • 43 •

By way of defining practice by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nd material, the “practice turn”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challenges and transcends the mainstream philosophy of science. Latour’s principle of generalized symmetry forms the start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 in – practice. However, the problem of its semiotics obliterates the rationality of science. Later researches in the “practice turn” began to retrieval the rationality, which show a science of realism in the sense of generative theory: first, its concern shifts from representing of proposition to intervening of practice; second, the coherence theory is the “coherence” not only among the propositions but also between human and material, and from the coherence, new facts and their theories are enacted; thirdly, during the coherence, the object and the subject construct, exist and evolve each other in an irreversible coupled relationship.

(3) History and Practice: Root of Philosophy of Contemporary Scientific Practice in Perspective of French Epistemology*Liu Peng* • 50 •

Inspired by French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practice has developed itself to be a comprehensive academic enterprise. It advances the point that fact is constructed to be a full – fledged ontological constructivism and consequently distances itself from the traditional dualism. Epistemologically, contextualism drawn from French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and regional epistemology leads to some new ontological approaches to traditional epistemological issues. And fundamentally it establishes a descriptive methodology, illuminated by the tenet “science creates philosophy”, which paves the way for its ont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stance. In this way a distinctive relativist relativism comes into being and differentiates itself from the absolute relativism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

(4) Development Potential in Changjiang Economic Belt and Opportunities of Cross – Strait Cooperation*Wei Houkai* • 56 •

1979 ~ 2008 saw the sharp decline in the economic position of Changjiang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yet it enters the stable increase and rapid growth in recent years. The spatial disparity of the belt has been alleviated since 2003. Past typical structure of “three levels” is replaced by dual structure between upper and middle reaches of the river, as the economic gap is being narrowed. As far as development trend concerned, Changjiang economic belt will possibly become dominant zone after the coastal economic belt to support the constant growth of Chinese economy and its developing space and potential are mainly focused on the upper and middle reaches.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Changjiang economic belt will not only bring more opportunities of cross – strait cooperation, but also lay a strong foundation for long – term medium or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5) Micro Performance and Macro Equilibrium of Managing Institutions of Work – Family Integration: Management Innovation in “Internet + ” Era*Liu Yongqiang Zhao Shuming* • 79 •

“Internet + ” era brings forth a work – family (WF) boundless workplace where WF relations develop from conflict and segmentation into integration. There appear managing institutions of work – family integration which balance, enhance and synergize WF relations, and can maximize production of market products, i. e. return on economic capital, and that of non – market products, i. e. return on social capital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organization and family. It is found that the new institutions increase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the market products, and move the curves of both supply and demand to the right. However, the demand indirectly raised by non – market products affects price insignificantly. The price remains as the equilibrium price in the classic equilibrium. Meanwhile, these heterogeneous capitals can reinforce each other and produce even more returns under function of isomorphic utility, which goes beyond the benefit in classic equilibrium model. The integrative model works under pressure to expand the size of enterprises.